

第 4 卷第 5 期 2011 年 12 月

Vol. 4, No. 5, December, 2011

# 国际高等教育

## 再论大学排名

“锚定”世界大学排名 ..... 173

排行榜：要考虑的都做到了？ ..... 176

## 国际化问题

英语及其他语种：科学用语之我见 ..... 179

海外分校有未来？ ..... 182

国际学生对美国高等教育之解读 ..... 186

## 中东的高等教育

阿拉伯之春：高等教育革命已然启开 ..... 188

十字路口的埃及私立高等教育 ..... 191

## 非洲的高等教育

国际化新时代下的非洲合作关系 ..... 193

非洲研究网络的价值 ..... 196

非洲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国际经验 ..... 198

## 高等教育财政

谁从免费高等教育中受益？ ..... 200

厄瓜多尔的“免费”公立大学：过于乐观？ ..... 202

亚美尼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 ..... 204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学生事务发展 ..... 206

新书推介 ..... 209

---

## “锚定”世界大学排名

Nicholas A. Bowman、Michael Bastedo

Nicholas A. Bowman：俄亥俄州博林格林州立大学 (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 副教授

电子邮箱：nbowman@bgsu.edu

Michael Bastedo：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n Arbor ) 副教授

电子邮箱：bastedo@umich.edu

毫无疑问，学校领导人十分关心自己学校在各种排名榜单中的位置和表现。他们认为高等教育里里外外的众多因素都要靠国际或国内排名来反映学校的表现到底是“不错”还是“优秀”。倘若如此，那么这些排名有朝一日就真的等同于学校的声誉。

据猜测，排名可通过锚定效应 (anchoring effect) 来影响大学声誉，这也被称为“锚定与调整法则” (anchoring-and-adjustment heuristic)。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模棱两可的情况要做出判断时常常会先找出一个起始点，就如同估计罐子里安心豆粒糖的数量。例如，一般情况下，人们开始时往往都从一个数目猜起，到底是低于还是高于一个较大的数目，如2000颗，而且人们都非常容易从一个大数字开始猜起，做出的估计要比其确切值高得多。研究表明，这些锚定效应也会发生在专家身上，出现在一系列重大的真实的情境中，例如评估房产值、罪犯判刑的时间长度等等。

直到十年前，全世界各大学的声誉表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尽管很多人都认为英国牛津大学 (Oxford) 和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 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学校，但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或者清华大学 (Tsinghua University) 应该排到世界第几呢？这两所大学在哪些方面更出

众呢？于是，2004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简称THES) 的“世界大学排名”自然而然地尝试了用声誉指标对世界大学进行衡量排名。自THES的排名结果公布后，那些想要鉴定“顶尖”大学，或是想要检验自己机构所属排名的人们就有了一张可以参照的正式名单。在后来的顶尖大学声誉评估调查中，许多被调查者会直接引用这张名单；换句话说，那些曾经看过排名表的人或许会给本已排名靠前的学校更多有利的评价。

### 考察锚定效应对于大学声誉的影响

为了考证早期的THES世界大学排名对其后续排名有否锚定效应，本文考察了THES世界大学排名前三年的排名结果以及其相应的声誉评价情况，这些资料都采集自全世界众多的专业学者，包括教职员工、行政人员等。

所收集到的数据支持了以下三个假设。第一，与锚定理论一致，最初的THES排名与声誉评估的提升有关。也就是说，在声誉评估调查的第二年和第三年，那些被要求提供声誉评估的专业学者，不论是潜意识还是非潜意识，都会被第一年的排名结果所影响。与此同时，第二年排名结果显示与声誉评估结果之间的关系要比第一年更为密切，这

就意味着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排名与声誉已经结成了亲切的联盟。

我们没有理由猜测相反的模式也会发生，即声誉也会导致排名的上升，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一关系的存在。这种“未发现”充分证明了排名会导致声誉的提高，反之却不亦然。

因为第一年的排名结果为众多的机构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形式化的等级并由此为潜在评估者未来的评估提供了详细的信息，所以我们猜测第一年的排名结果对声誉的影响更大。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一年的排名表现导致了后两年学校声誉的上升，但是第二年的排名结果在对后几年学校声誉方面没有显著影响。

## 结论和启示

排名众多的用途之一，就是为消费者在决定选择哪所学校时提供有用的信息。多年来，排名的平等性和有效性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排名的声誉评估也遭到众多的批评，其中很多批评也是有其道理的。

我们的研究也力证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由于锚定效应是基于一个已经确定的心理效应上产生的，它似乎在不同的全球排名中都有广泛的影响。当我们发现排名和声誉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而变得越来越小，并且排名结果也趋于稳定时，再要坚持声誉的好坏独立于排名之外的说法，就很难站得住脚了。

设计有效的声誉调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主要问题包括要求调查对象评价那些他们不熟悉的学校，并且学校质量提升和随后带来的声誉表现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滞后。因此，解决方案之一就是要求调查对象只去评价那些他们了

解熟悉的大学。但不幸的是，这样操作的结果就会造成兴趣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体上，学校对自己的竞争对手非常熟悉，这些学校都为了更高的排名位次而相互竞争。

如何进行声誉调查或许在许多大学排名系统的主要问题。进行大学排名的组织必须有具体的评估标准，从而能够以此为据来鉴定结果，也必须确保调查者充分了解所要排名的学校。并且，对不同院校以及各学术领域的教职员做样本调查，能够提升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声誉调查可能一时还不会销声匿迹，因此对声誉调查本身做实证研究并且使得声誉调查信息更加丰富、更加可观就显得格外重要。

简单的去除声誉调查不能解决问题，就像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中所应用的一样，对于机构所谓的“客观”措施也不能够完全反映学术质量的内涵。除此之外，对这些客观的衡量方法越重视，学校就会在越大程度上仅仅重视对诺贝尔获奖者或者高被引科学家的聘用，以此提升学校的排名，但是实际上学校学术项目的质量并没有得到提升。

同时，我们对于相关学校声誉的知识需求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需要有专人来提供此类信息。与其让那些不称职的人来做这件事，我们应该鼓励那些在此方面有建树的人去做这项研究。

我们认为新的“世界大学排名”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出了重要的一步。通过要求同行专家评价相关领域的教育项目，评估结果会更有效度，更值得信赖。专业学者在各自感兴趣的领域能够很好地相互监督，排名也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社会学家评估社会学家，物理学家评估物理学家，就更能评估

教育项目质量方面达成专业性的一致意见。

作者注：本文节选自期刊《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里面名为“世界大学排名  
的锚定效应：探索声誉得分的偏见”

[Anchoring Effects i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Exploring Biases in Reputation  
Scores]一文；若想要阅读更多有关排名的文  
章，请登录 <http://www.umich.edu/~bastedo>。

## 排行榜：要考虑的都做到了？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负责研究和校企合作的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如今很多关于大学排名的争论都是关注其方法论的问题，该采用何种指标和权重，统计过程的可信度如何，不一致性为什么会出现或不会出现等等。当然，也有人抱怨大学排名过多的依靠研究指标，而不能表现教学质量。然而，这些争论对于眼下国家或学校机构越来越多的采用定量法驱使决策制定的现象却鲜有评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用数字决策”。一般说来，绩效指标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大学排名是否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或者说，因为指标能刺激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测量大学在这些指标方面的表现，还是在以达到指标测量为目的而做出相应的行为呢？这其实是“目标置换”(goal displacement)的一个经典案例！

### 选择性

学生入学水平(student-entry level)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学生表现的一个良好指标，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假设前提，即假设一个学生的表现在其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比方说，美国学业成绩测验(US Scholastic Achievement Test)的分数与学生的毕业率、保留率、毕业后收入以及研究生入学情况有很高的相关性。其他高等教育体系和机构采用大学入学成绩、预试或中学成绩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学排名强化了这种做法，比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和《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世界大学排名都将学生入学成绩纳入教育质量的测量指标，其权重分别为15%和9.5%。因此，高素质学生生源越多，大学排名分数也越高。那些能力强的以及第二代移民学生，即亚洲背景或非美籍公民，想攻读博士、医学或法律学位的，对这些大学排名尤为敏感。这样，排名、名誉和选择性之间的关系滋生了恶性循环。

选择性正成为高等教育和学生行为一个反常的驱动因素。大学通过实施一系列学籍管理办法提升其排名表现，这些办法包括在保留相同空位人数时控制申请接收名额，这样其选择度指标就会上升。高等教育机构也可能限制班级或学生群规模。此外，他们还可能以更高的学费标识选择性，这一点可以从大部分英国大学的学费最高可达9000英镑(约1.47万美元)看出点端倪。其他大学则会使用经济补助吸引高素质学生，而非最需要补助的学生。跟许多美国大学一样，英国政府也鼓励大学给高成果学生提供“特惠补助”。

### 毕业率

如今，政策关注的绝非只是入学人数，还包括在特定时间内实际完成学业并毕业的

人数。这样，责任便转移到这些机构身上，他们要保证学生顺利结业。《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排行以及欧盟新的排名“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会衡量一所教育机构的预测毕业率；后者还衡量毕业生就业能力。毕业生就业能力通常通过雇主问卷调查来衡量，如“QS世界大学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所作的调查等。

然而，这类指标表现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包括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等。衡量毕业率，对于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或者社会弱势种族群体及成人学生来说不一定有利，他们的生活或者家庭环境往往会干扰他们的正常学习；然而，衡量毕业率可能会鼓励学校摒弃一些教育标准。

这种做法也许会对一些学校带来不利，这些学校可能正努力为新生提供更多入学机会，或者是为部分学生转学至排名更好的或者其他大学学习的机会。证据显示，已有学校正在摒弃扩招计划或建立独立学院的计划，这样在毕业率指标上的欠佳表现就不会影响大学的整体排名成绩。上述提及的大学的大学中，也有部分正在修改其奖学金制度。

获取首次就业数据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时限问题。通常，这些调查都集中于学生毕业后的前6~9个月，然而这对部分职业来说是不充分的，而且也不能区别其就业水平与毕业生就业能力匹配程度。尽管时限在经济增长活跃时期可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如当前这样一个经济衰退时期的教育质量呢？

## 衡量研究

用文献计量和引用数据衡量研究生产力和影响力，是评估学术和研究质量一个广泛

使用的方法，也是各种排名的关键指标之一。其中一个相关做法就是排名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的质量由当地、国家或世界范围的科学研究决定。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授予两种期刊20%的权重，即《科学》(Science)和《自然》(Nature)；SCImag期刊排名(SCImag Journal Rank)基于引文来源信息，采用期刊的科学威信(science prestige)等指标，对期刊进行排名。

尽管学科规范、机构规模和历史等因素不容忽视，数量与质量还是休戚相关的。这样势必有利于规模更大、历史更久的大学以及那些出版习惯更迎合上述排名要求的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和医学学科。也就是说，其他重要资源或出版形式，如专著、会议论文、国际标准或政策报告投稿、电子格式或公开的出版物等等，都被忽略了。与国家相关的、跨学科但非英语语言研究也极少被报导，也被低估了。

许多政府、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都将大学排名与资源分配相联系。难怪这些趋势已然扭曲了研究重点和研究管理：鼓励教师撰写期刊文章而非反思性专著或政策论文；抑制了挑战知识难题的积极主动性，或者相较于艺术、人文或社会科学更青睐“硬科学”；公布各种聘用晋升相关条例。

## 教训

上述这些简单的例子都对这种以指标塑造决策和刺激行为的方式提出质疑。确实有大量证据显示，全世界的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都在有意地以这种方式采用大学排名，将其转化为各种绩效指标，以此来制定学校目标并与奖罚措施相挂钩。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则正对其国家教育体系进行深刻的结构性

变革，旨在将少数的几个精英大学推至世界前10、前50或前100名。

大学排行榜的历史显示：衡量错误的指标会造成结果扭曲。2009年，美国国家州长协会最佳实践中心（the US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也给出了类似的警示：反对依赖那些会滋生负面激励措施的方法。对所有政府和教育机构来说，这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

作者注：本文基于2011年由美国纽约麦克米兰公司[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排名与高等教育重塑：为一流卓越而战》[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而作。书目详情可访问网站：<http://www.palgrave.com/products/title.aspx?pid=391266>。

## 英语及其他语种：科学用语之我见

Jorge Balá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国际公共事务学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电子邮箱: [jb3369@columbia.edu](mailto:jb3369@columbia.edu)

在过去数十年间，英语占据了国际性出版刊物的大半江山，其比例一直数倍增长。大部分权威科学期刊，包括一些之前以其他语种出版的杂志，都转而以英语发行；不过，法语及俄语刊物没有较明显的改变。这些刊物选择英语的原因无外乎在于吸引更多的投稿人士，以及更广大的读者群，乃至扩大其影响力，如以刊物被引用次数来衡量。因此，英文刊物中，非安格鲁国家的投稿人（尽管这些人并不能充分代表其社区）比例不断增加，而非英语刊物大多为在本国或本地区范围内发行。

然而，在非安格鲁地区，如中国、印尼、伊朗、土耳其、欧洲南部和拉丁美洲，随着科学组织的飞速多样化发展，非英语科学刊物的数量也在锐增。事实上，纯英文科学杂志的数量所占比例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下降。尽管如此，世界上大多数有影响力的刊物都是以英文发行的。医学杂志的变迁恰恰体现了这两种发展趋势：国际医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都以英文发行，并收录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the 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数据库中；与此同时，与医学相关的、非英语的非主流杂志（peripheries，即位于边缘地位）数量也在迅速增长，这些杂志旨在服务当地医学教育及医疗研究。这部分的期刊主要以医学界主要研究语言出版，如德语或法语，也包括其他语种。在这

种情况下，学者及科学家在自己本土的圈子里，用自己的语言，与决策者及病人交流并取得更佳的沟通效果。英语是全球科学交流的通用语言，但是某些语言由于本土或国际通用范围的影响，其地位也不可忽视，比如说汉语普通话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哈萨语在本土范围内通用程度非常广泛，西班牙语和法语在国际范围内通用程度也相当广泛。

在人文科学领域，英语的统治地位及“中心语言”（central languages）与“边缘语言”（peripheral languages）的差异，没有很明显的体现。只有少数国际权威期刊是以英文发行的，而人文社科类文献的收录情况因语言覆盖面的不同而差异巨大。现今，许多期刊都采取了双语发行的方式，即提供英语译文和原文对照。在某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英文期刊大多是以翻译之前用本土语言发表的作品为主。几乎没有人文社科类期刊会放弃本土语言而转以英语发表，当然少数学科是例外，如心理学。在一些领域里，如文学、历史、人类学，专著发表比期刊文章更为重要。这些专著最初以本土语言发表，少数会被译成英文或其它语言。

为了国际影响力和提升其国家或机构的国际地位，人文社科学者迫于压力，也不得不以英文发表其作品，因为影响力是以作品被引用次数来衡量的。然而，这些学者同样面临着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术机构及政策施加

的压力。在许多国家，国际化政策与语言政策两者是背道而驰的，前者偏爱英语，而后者则重视本土语言。

### 国际（英语）出版的花费及风险

在当今国际英语期刊中，有国际影响力的非英语本土学者寥寥无几，这恰恰证明了他们与以英语为母语作者相比，处于先天弱勢地位。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时间和精力消耗问题，因为非英语本土学者显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将其作品译成英文，而且他们常常需要依靠专业的译者。国际权威期刊通常需要让英语本土人士审核校对这些译稿，使之合乎“标准”英语规范。一些相关科学期刊出版的研究表明，英语本土作者与非英语本土作者两者相比，文章投稿被期刊接受率相差很大，而且非英语本土作者需要更长时间校对修订和重新投稿，这样就增加了非英语本土学者的出版花费，也降低了其效率。

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顶尖院校的学者，如中国学者，都表明他们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英文作品，是一些对大学排名极为关注的大学管理者所支持的；另一方面，学者们也需要以母语发表文章，以获得国内的读者群，并且在公众导向与政策制定中有合法性体现。国内的一些英文翻译似乎是可以达到这两点要求，但缺乏国际权威刊物的影响力。

在阿拉伯国家，社会科学家面临的一大困境是舍本土、求国际，还是舍国际、求本土。许多以英语或法语为教学语言的顶尖大学，评定教师业绩是以其出版在国际同行评议期刊上的文章数为标准的。在国内以阿拉伯语或其它语言发表的作品，在评定教师职称时落入无用之地，从而造成学者的研究内容脱离国内读者真正关心的问题。与此相反

的是，公立学校则是以国内为导向，教师用阿拉伯语在本国发表作品，自然也就无法登上国际刊物。这种根据语言和国内/国际焦点的区分似乎对整体的学科产生影响，如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学科。

### 国际大学及其他

现在，许多西欧、东亚和中东国家的大学都自诩国际化学校，因为他们的学生和师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院校通常会用英文教学，或说得更为准确，就是用英文的“社交语言”，这种所谓的国际通用语实际是与英语国家推行的“规范”学术英文大相庭径的。另外，这种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方法并没有排除学生在课后仍旧用其他语言进行交流的可能。比如说，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对该地区国际大学课内课外活动的语言使用作了调查。学者们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生，比如荷兰、新加坡和中国，对英语的运用截然不同，以至于运用英语的环境不同、使用的英语语言与“标准英语”差别甚大。鉴于国际大学应该是国际研究的一部分，而研究出版物又以英语为主，因此英语书面表达急需规范化。在美国和英国，为了让攻读博士学位的国际学生能够更规范地完成他们的论文，学校为他们准备了指导手册，规定了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结论等部分的写作表达方法。然而，如果这些标准推广到非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去，那么因语言和文化传统而产生的差异性也就会消失无踪了。

在许多非英语母语国家中，多数学校和教学项目，招收越来越多的学生，这些大学和教学项目都是以本土语言来进行日常活动的。不论本科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是如此。虽然英语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学生的第二语

言，但是英语并不是学生在学习以本国国情为主的学术专业时所用的语言。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除了少数例外，如自然科学和数学专业等，学生引用的参考文献中大多都是以本国语言出版的，或是原著，或是译著。最后，网络学术资源的频繁利用，也反映了电子交流时代多种语言百花齐放精彩，虽然之前一直是以英语占据主导地位。

## 结语

世界上各种语言，包括英语，都将继续存在于国际高等教育和研究中。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全球化，翻译方面的投入需要加大，如此方能保证多样化的学术作品更快速有效地传递给全球读者。毋庸置疑，翻译成英语后，资料将能够被推广传递到世界上更多的英语国家和其他地区。

## 海外分校有未来？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 ( Boston College )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 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海外分校，似乎是近来非常风行的现象，或者说，可能是近10年来一直流行的。绝大多数发达且主要是英语国家（但不仅限于这些国家）的大学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海外分校，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根据英国的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的调查，2009年全球共有162个海外分校建成，其中美国大学占了总数的48%。无疑地，自那以后分校数量开始急剧增长。阿拉伯海湾国家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这些国家盛情邀请欢迎并资金赞助海外大学建立分校，以其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战略的一部分。比如，卡塔尔最大的城市多哈现今就有六个美国大学和一个英国大学设立的分校。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其他海湾国家也有外国大学的分校。在阿拉伯海湾成为海外分校青睐之地前，最受关注的地方是新加坡，可谓是一个高等教育枢纽。

面对当前的海外分校热，一些根本性问题值得思考：什么是海外分校？他们经得起时间考验吗？他们可以给学生和学术界提供怎样的特别服务呢？

### 什么是海外分校？

迄今，“海外分校”仍然没有普遍统一的定义。大多数观察者似乎一致同意这样的说法：“国际海外分校”是一个与特定大学相关

的实体，其主要办学地点位于一个国家（本部），但在另一个国家运作、管理且独立提供自己的学位课程。只要学生顺利完成课程，并在国外的分校完成，学生就可以获得该国外大学机构授予的学位。这个定义不包括联合学位课程（joint-degree programs）、结对计划（twinning arrangements）、为来自大学本部学生提供服务的海外校园、学位特许（degree franchising）和其他国际计划。在少数情况下，一些海外分校也会给分校的学生提供条件在本部大学完成部分课程，还有一些分校会给来自大学本部的学生提供“海外学习”的条件。

这个简单的定义必须从一个根本层面来解读：海外分校学生获得的教育经历与其在大学本部所获得的教育经历实质上是否一样？两地的教育质量可以相提并论吗？分校的教授是否也来自大学本部？分校的校舍设施能否与本校不相上下，即在阿布扎比能否建造与位于美国纽约华盛顿广场同样的校舍呢？换句话说，一个海外分校学生能否接受与本部一样的或是几乎一样的教育？只在学位证书上挂上一个大学的名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确保为海外分校提供实际的教育质量和至少与大学本部相似的学习体验和文化才够资格授予这个大学学位。只要稍微差一点都会“砸掉牌子”，并且不能冠名“海外分校”。

## 可持续性问题

除个别情况外，海外分校基本上是近几年建立起来的，因此从这些有限的经验中我们还很难吸取一些教训。尽管如此，一些有关可持续性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

**入学问题：**随着时间进展，海外分校能招到与大学本部质量一样的生源吗？招生方面已暴露出大量问题。比如，2007年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由于入学率低，不到一年就撤销了其新加坡分校。据报道，大部分建立在海湾地区的美国大学海外分校招生率都很低。在海湾地区，是否有足够多的满足入学成绩要求并且有学习感兴趣的年轻人来填补已有海外分校的招生名额，仍然不确定，更不用说新建立的海外分校了。

有些分校认为可以去印度招收生源，因为印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然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学生更青睐在美国学习，而不是海湾地区或印度国内的海外分校。他们想完全体验美国文化，可能的话，还想毕业后就留在美国工作。但是在海外分校就读的话，就没有这些机会了。来自中国的数据显示，学生不愿意为在中国的美国大学分校学习而支付与美国本土学校一样的高额费用，也有对师资、学校设施、课程设置方面的担忧。尽管在西方国家求学的沙特阿拉伯学生中有21%是女生，但是海湾地区的海外分校从该地区招收了大量的女生，这些分校认为许多家庭都不愿让自己的女儿去西方念书，而且更倾向选择当地的教育机构。很明显，这些学校的这些想法错了。此外，海湾地区人口基数小也意味着高质量的学生数量也是有限的。更为复杂的是，海外分校和当地大学通常都需给许多还未完全达到入

学水平的学生提供长达一年的预备教育，因为他们欠缺英语语言能力，中学的预备教育也不足。对于如卡耐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或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这类录取学生条件相当严苛的学校来说，其海外分校能否长期持续招收到符合条件的学生十分令人怀疑。

尽管不可能直接获取数据，但已有一些报道显示大多数海外分校未能达到招生目标。招生是很难估计的，且依赖诸多因素，包括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现在仍不确定眼下中东动乱对当地的海外分校会有怎样的影响。随着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教育枢纽的出现，它们的竞争势必也会越来越激烈。

**师资队伍：**海外分校要求该校教师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与该校本部一样的真实学术体验，并不是说只要几个教师飞到分校，开几门“密集型”的周末课程就了事的。海外分校能否吸引这些大学本部的教职工到分校待上一学期或更长久？能够常驻分校的老师是必须的。此外，仅有居住在海外分校地区的临时兼职教师或那些拥有大学本部授予的博士学位的当地居民是不够的，来自大学本部的教职工必须愿意在分校执教一年或更久才有用。这就再一次提及了海外分校的概念，即复制大学本部的学术及其它体验。同样地，在学生事务或其它部门的关键行政人员也必须来自大学本部，或至少有过本部任职经历，目的在于给分校学生传递大学本部的办学精神。

经验显示，很难说服大学本部教职工去一个海外分校长期执教，即使那里的薪水和其他福利都十分吸引人。甚至小部分具有国际意识的教职工自愿去了海外分校后，要他们去说服其他人去，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让夫妻和子女因工作而远离他乡绝非易事。那

些热衷研究的教职工，尤其是硬科学领域的，考虑到分校的实验室与本部不可同日而语，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实验室。

资金投入：名牌大学的海外分校能从东道国、相关机构、地产商或其他实体得到一笔高昂的启动资金。一般来说大学本部会提供少量前期投资，个别情况下，如阿拉伯海湾地区提供了巨额补贴。但是，海外分校还要投入相当一部分非资金支出，包括大量行政人员和教职工花费在规划、与东道国政府和机构协商等方面的时间。课程设置、执行人事政策、与各种利益相关者共事都需要时间，也间接需要钱。

随着海外分校的不断发展，保持资金持续投入是另一个挑战。大多数大学都不希望分校耗用本部资源，确实也有一些机构期望从在海外分校的投资获取利润。考虑到海外花费公款有诸多限制，对公立大学来说，公款方面的法律要求又是一大挑战。海外分校可能要承受尽快取得“收支平衡”的极大压力。在财力雄厚的地方，如海湾地区，这种压力会少一点，但是分校最终还是要保证财政上能持续发展。

虽然现在鲜有可获取的数据，但事实似乎显示：财政上最成功的海外分校往往是那些有欠盛名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赞助的分校，它们会为分校提供一些项目计划，而这些项目计划不需太多花费而且在海外又有一些既得利益。通常，它们的质量标准较低，且只关注“底线”标准，很少考虑与当地的相关性。

一个优质的海外分校，即使规模不大且专业性强，也要求细致的财政规划，其中需要考虑诸多难以衡量或预测的因素。大学本部协调和管理成本、直接指导、维持合理入学率和收入水平以及其他各种变量都是极难

预测的。

## 学术自由

人们还担忧海外分校的学术自由问题。虽然关键领导人和相关协议都保证学术自由，许多教职工还是有这方面的忧虑。有人担忧：倘若杜拜分校的一名教职工邀请了一位以色列人作讲座，或开设了一个批判权力机关的专栏，结果会怎样呢？在一个没有一流学术自由历史的国家里，权力机关会如何处理这些分校的学术自由问题？

## 大学本校校园政治

海外分校的各项举措典型地是由顶级大学管理层提议的，而非教职工或学生。这些举措可被视为提升大学国际形象、推进国际化和争取收入的一个方式，也是大学达到其他机构战略性目标的一个途径。不管是规划还是执行分校措施，都很少有更高层学术群体介入。确实，通常很难让教职工和学生信服分校值得他们承担所要求的额外工作、风险和承诺。不“买进”一批教职工，要成功是很难的。相关报道披露了一些对于纽约大学海外分校的抱怨；密西根州立大学海湾分校的失败原因则被归咎为学校部分人士的反对。最近，媒体也报道了一些反对耶鲁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伙伴合作关系的消息，主要是因为学术自由和其他方面问题的牵扯。国际投资在澳大利亚大学也频频遭受大量抱怨和反对，学术界批评这些商业动机，反对它们与大学的核心学术使命脱轨。几乎所有关于海外分校建设举措的新闻报告都特别报道了管理者和部门员工之间的争论。

## 海外不确定因素和政策变化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也是世界许多地

区政策不稳定以及国家政策和相关有限制度发展转型的年代。海外分校是在国家范围内运作的。当前的“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的政治社会动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足以反映政治环境变化剧烈的程度和不可预测性。从中长期看,中东政治和社会变动对当地海外分校会有怎样的影响仍未可知。

当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学生市场之一,有关海外分校和其他国外高等教育举措相关的政府政策讨论就是当前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一个佐证。国际合作条款与条件将面临翻天覆地的改变;而在实践层面,如何在一个以不透明条规著称的国家启动执行这些政策等相关问题也必将涌现出来。海外分校对这些正在变化的、有时甚至是不稳定的环境的招架力是很弱的。

## 不同期待

经验显示,赞助大学和东道国或赞助商之间必然存在冲突,导致严重的问题。他们

对合作协议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有时会引起参与方之间起冲突,甚至会导致分校关闭。由于对协议不同程度的解读所导致的冲突,即使在海外分校现象初期也已经十分明显。倘若其中一方,通常是东道国,正投入大量资金,这些问题则会变得更加严重。

## 一个泡沫?

明显地,海外分校正面临大量根本性问题。即使基本概念是可行的,其风险也是相当大的。即便人们接受各种慷慨激昂的评论和各种启动计划方案,海外分校仍将可能成为一个泡沫。这里有必要回顾下历史:上世纪80年代,20多所美国大学纷纷涌向日本建立分校,但仅有2个幸存下来。与当前的形势相似,各种误解、先期计划不足、双方不切实际的期许以及跨文化间产生的疑惑等都导致了当时大多数对日本海外分校投资的失败。

敬告各位,这就是教训!

## 国际学生对美国高等教育之解读

Patricia Chow

美国国际教育机构 (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研究与评估部门

电子邮箱: iieresearch@iie.org

《国际教育交流门户开放报告》(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表明, 2009~2010年间, 美国共有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9.1万名学生。虽然美国并没有制定全国性的国际学生招生计划, 但是许多传统的或是正在兴起的国家都制定了国际学生招收计策, 并为广招贤才营造了国际性的竞争环境。最近几年, 许多东道国不遗余力创造国际化学术机构, 并且国际学生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为了解国际学生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看法, 美国国际教育机构与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 (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 及其下属办公室 ( EducationUSA ) 合作, 在11个重点区域对当地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考察他们的态度和看法。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问题: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希望在美国求学? 学生希望在哪些方面进行深造? 美国是否是学生的首选? 在美国求学会面临什么样的障碍? 国际教育机构在2009年于越南及印度, 2010年春于墨西哥、泰国和香港, 2010年夏于巴西、德国、土耳其和英国, 2010年秋于尼日尼亚和南非等地分别进行了调查, 共收到9330份有效答复。

### 被访者资料

大部分被访者 (55%) 是女性; 35%目前就读于高中; 40%具有本科学位, 即已完成

本科生学业但不具有硕士学位; 15%硕士在读; 10%属于其他学历, 包括无学历学生和两年制职业学校学生。

### 学生偏爱的留学国家

根据一道开放式问题的回答, 大多数人选择美国作为其首选留学目的地, 其中75%有留学计划的学生表明美国是其首选, 其次是英国, 再者5%选择加拿大, 3%选择澳大利亚。

这项结果恰恰反映了全球学生的流动模式。目前, 世界上330万在海外求学的国际学生中20%在美国, 英国国际学生占13%, 法国8%, 德国7%, 中国7%, 澳大利亚7%, 加拿大4%, 日本4% (地图参考: [www.iie.org/projectatlas](http://www.iie.org/projectatlas))。虽然西班牙并没有被列入八大留学国家, 但在此求学的拉丁美洲学生不在少数。

### 留学国家之印象

相比于其他国家, 大部分学生对美国的呼声是最高的。多数学生倾向于在美国求学, 这一点也是意料之中。不过, 学生们偏爱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超过76%的学生认为美国提供的学校和项目最多, 35%认为英国次之, 28%认为加拿大位居第三。与此相似, 76%受访者表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更为高级, 50%认为英国次之, 33%认为加拿大位居第三, 31%认为德国第四。除此之外,

超过 69%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国际学生最为开放, 42%认为加拿大第二, 34%认为澳大利亚第三, 33%认为英国第四。

除此之外, 59%学生认为美国提供的奖学金项目多, 57%认为美国能提供良好的学生服务。在这两方面, 相比于加拿大 22%和 30%的认可度, 美国远超其他国家。然而, 60%学生认为美国学费最为昂贵, 51%认为英国学费与美国不相上下。除此之外, 49%学生认为美国国际学生护照申请程序最为复杂, 23%学生认为英国第二。54%学生认为英国的生活费用最为高昂, 45%认为美国次之, 34%认为日本第三, 33%认为法国第四。

语言方面, 97%学生认为日语最难掌握, 56%认为德语和法语次之。

研究表明, 尽管没有制定确切的吸引国际学生的政策, 美国仍然在国际学生市场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优势, 并拥有多种吸引全球学生的“推动因素”(pull factors)。其中, 高水平教育和多样化教育为最关键因素。美国对国际学生的开放和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 “阻力因素”(anti-push factors)的存在不可忽视, 包括昂贵费用等。留学护照办理难也是一个负面因素, 尽管其影响力不及高昂费用产生的阻力。

## 阿拉伯之春：高等教育革命已然启开

Andre Elias Mazawii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教育学院教育研究系教授, 马尔他马耳他大学 ( the University of Malta ) 欧洲——地中海教育研究中心 ( the Euro-Mediterranean 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 特聘教授

电子邮箱: Andre.Mazawi@ubc.ca

让哲学家和医生训诫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每个都只是外部链接的一个联结而已

没人能疏漏, 破坏和僭越

——Omar Khayyam

Edward Fitzgerald 译

从突尼斯、埃及掀起的推翻统治者并更迭政权所发起的大范围游行, 后又从阿尔及利亚延续到也门, 再到利比亚、叙利亚、约旦和巴林, 为阿拉伯地区迎接新政治黎明带来了希望。一些观察者将抗议行动比作“火山”, 呼吁新公民形式, 建立国家合法性的新基地。评论家将其看作一个姗姗来迟的“政治春天”(political spring)。有些人则想到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 或者说, 复兴的“阿拉伯觉醒”(Arab awakening)。另外, 也有人认为这是引入新政治形式“革命”的分水岭, 关注人权和公共参与问题。作为响应, 统治精英们疯狂引进各种改革举措, 企图遏制并引导紧随其后的合法性危机。此时, 人们开始质疑: 整个阿拉伯地区爆发的政治动荡和这些四面楚歌的政治精英们引介的举措对国家以及其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怎样的冲击力?

### 高等教育和政权合法性

阿拉伯地区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维护一个政权自我设定的“德政”形象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高等教育为年轻一代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入学机会, 尤其是那些出生于社会经济条件欠佳阶层的群体以及那些急切渴望进入结构局限的劳动力市场的学生们。同样地, 它们可以保证给大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提供稳定的公职, 主要与中层或中上层阶级有关。其中, 后者代表渐强的政治力量, 涉及一系列并不总与政权正统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另外, 它们还给统治阶级一个很大的空间, 从专业人才中招募或指派大臣、高级专业干部和政治决策者。

统治阶级调控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任命, 通过限制教职工和学生参与管理和遏制反对派而展开一些“改革”。比方说, 在埃及, 1994年的法律条款142将学院院长、系主任等划入高等大学官员之列, 由高等教育部长任命。这样, 大学董事会大部分成员是部长委任的, 那些未被任命的则鲜有发言权, 如教职工和学生。

### 政策议程前后矛盾还是值得恭维?

高等教育政治从属关系中的国家介入伴随着一系列政策的产生, 这些政策旨在通过

增强责任感和经济自由化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重新对接, 企图提升学术和行政领导层的创新能力, 改进管理。埃及的“高等教育增值项目”(Higher Education Enhancement Project), 由世界银行资助, 以及作为欧盟“坦普斯计划”(TEMPUS)中一部分的叙利亚的“优质大学管理和机构自治”框架(Quality University Man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Autonomy framework), 都是很好的例子。决策者还援引国际大学排名榜单上靠后的大学为重组高等教育辩护。

因此, 政治从属关系和经济自由化相互给养。一方面, 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国家政治关系破坏了一个真正的大学学术领导层的出现, 而强调决策的专制模式。另一方面, 为提升高等教育的经济贡献而推出的改革引入层层问责制和新学术工作条件, 但并未保证学术自由或质疑现时的专制管理模式。作为所谓构建“阿拉伯知识型社会”的一部分, 自由化改革(财政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引进高等教育新形式, 如私立院校、国际院校和营利性机构等, 企图为得到国家赞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备选方案。尽管每个国家的运作环境不同,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践行这种做法, 如突尼斯、埃及、约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中的一些小国。

统治阶层和决策者限制与“人力资本”相关问题的讨论以协调这些明显有矛盾的政治话语。他们将重心放在可衡量的高等教育表现指标上, 如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就业能力和毕业生经济汇报率等。但最利于高等教育机构繁荣发展的政治环境却被忽视了。因此, 涉及教职工和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管理及培养研究文化方面的问题则完全未被提及, 以至于助长怨恨、导致隔阂, 使其与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相关的幻想破灭。高等教育机

构内政治从属关系进一步腐蚀了这些机构传统上所拥有的公信力。正如社会学家穆罕默德·沙菲克(M' hammed Sabour)在《知识分子在阿拉伯学术界和社会中的本体和地位》(The Ontology and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in Arab Academia and Society)中所提到的一样, 这种从属关系还暴露出学术边缘化问题, 即如果学术界人士不冒着政府政权反击和报复的风险, 通常就无法从机构内部平台“向权力说出事实”。

由于阿拉伯国家对国外顾问和知识技术的过度依赖, 限制了高等教育的某些能力, 使其无法高效地应对发展挑战, 也无法通过可行的方法实现知识技术本土化, 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教育领域。矛盾的是, 尽管在当前政权争端风波出现之前, 政权重组改革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但是这些改革却不无例外地暴露出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对岌岌可危的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过度依赖。

## 从机构内部重组高等教育

至今还不清楚在当前的政治论争下国家高等教育会出现怎样的格局。对于当前发生的争论是否会以及将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也不甚明晰。然而, 可以明确的是, 要提高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能力, 国家与民间社会团体和相关组织必须认识到, 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作用不能独立开来。

同样明晰的是, 大学教师学者需要批判性地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结构的基础, 并且反思他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牵连, 用自己的力量发展研究。这样一种评判性参与不仅能助学术工作在发展中重新树立核心地位, 并且也能将学术工作与社会参与以及社会转型紧密相连。

树立此核心地位的前景不仅仅取决于扩大教职工与学生参与性的管理改革，或者专制政权的颠覆，当然这些都极为重要。但最为主要的莫过于大学教师的艰苦奋斗，努力构建一种包容的“知识文化”，构建一个了解

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向往能力”（capacity to aspire）和“求异能力”（capacity to differ）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没有任何政权或其他权力形式能“疏漏、破坏和僭越”这两种能力。

## 十字路口的埃及私立高等教育

Daniel C. Levy、Manar Sabry

Daniel C. Levy：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著名教授兼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负责人

电子邮箱：dlevy@albany.edu

Manar Sabry：曾就业于国际性及埃及政策机构，拥有纽约国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博士学位

电子邮箱：msabry@buffalo.edu

穆巴拉克政府被推翻后，埃及面临着动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这些局势决定着高等教育的出路。因此，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命运具有研究价值。私立教育是否会继续繁荣，会否受到民粹主义的压制，抑或是走向其他的路径？通常来说，革命是与私立高等教育背向而驰的。

而这场埃及革命正爆发于私立高等教育在全国及地区范围内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事实上，在中东国家范围内，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尚属新事物。除却少数教育先驱，如位于开罗的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许多国家的私立教育仅仅只有20年左右的历史。在1992年的一项法案中，埃及首次通过了允许私立大学存在的决议。在许多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埃及是阿拉伯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 私立教育的规模及发展

私立教育的近况显示，私立大学在埃及所占比例还是相当小的，仅占全国180万招生人数中的4.2%（2010）。然而，这个比例已经是五年前的两倍了；并且，在此期间，私立大学的数量增至20所（全国总共有39所高校）。其中某些私立高校是刚刚成立的，并不符合招生标准，但是它们有推动私立教育产业发展的潜力。私立机构分担了埃及83%的非大学招生名额，尽管这个数量不到

100万，但其比例还是相当大的，覆盖全国各类高等教育19%的招生名额。

在全球范围内，私立高等教育所占比例是31%，与此相比，埃及的私立教育所占比例较低，但在阿拉伯地区已是相当不易。虽然在许多中东国家都存在着非大学教育的私立高等教育，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除却黎巴嫩之外，公立教育一直是一种规范模式。尽管各个国家招收学生情况不同，但至少私立教育，包括私立大学，已经覆盖了几乎阿拉伯所有国家。私立教育所占比例在巴林为66%，黎巴嫩为55%，约旦为36%，阿曼为28%，也门为21%。但是，在叙利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等国家，私立教育（至少是私立大学）普及率均不足，只为10%。

另一方面，随着公立大学中“私立”学生的出现，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私立教育招生数量变得难以估计。事实上，公立高等教育经费无法满足剧增的高等教育需求，而政府机构或法律规定实施免费教育，公立大学因此无法通过征收学费来增加收入。私立机构的发展为此提供了一条出路。另一种办法是在公立大学开设“平行项目”（parallel programs），征收付费学生。由于公立大学教学质量好、社会地位高、受国家认可，许多落榜学生宁愿支付较高费用，选择公立大学。但是因教学质量低、费用与私立机构不相上

下, 这些“并行项目”也备受责难。

在埃及, 这种“并行项目”已被取缔。但是, 这并不是革命对私立高等教育造成的不利或攻击。事实上, 这项决议在穆巴拉克执政时就开始执行, 临时政府继续了采用该决议。

## 规范制度

但是什么样的政策会直接挑战私立高等教育? 临时政府无所作为,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开展的工作更是有限。刚刚上任的教育部长曾是开罗大学负责硕士生学业及研究的副校长, 他同时担任过某英属私立大学副校长以及一些法属私立大学的顾问。这是否表示私立教育机构可以高枕无忧呢? 选举产生的政府会有怎样的动作? 目前形势不甚明了, 以下一些问题更是值得深思。

其一, 总体上并没有迹象表明, 革命会对私立高等教育不利。除却左翼马克思主义者, 人民对私立教育是包容的。另外, 就目前而言, 不论哪个执政党在位, 私立教育都不会是主体教育。改革派倡导的“正义”、“平等”和“透明化”等理念是相当模糊的。然而, 尽管没有针对性, 这种理念通常会运用在削弱民办高等教育的法规制定中。

在任职之前, 新部长就私立教育面临的挑战发表了看法, 谈到了私立大学学生资质差这一问题。他强调, 私立高校需要制定明确的录取标准, 明晰研究方向和硕士生教育。但问题是, 如何制定恰当的录取标准, 同时维持并扩充招收率? 此外, 除却美国, 在其他所有私立大学中, 科学研究都不是学校发展的重点。学校在录取线、最大招生数和全

职教师最低比例等方面都有明确书面规定。然而, 怎样实施这些规定才是问题所在。部长同时希望私立高等教育减少对公立大学教授依赖度。

政府会制定怎样的政策来明确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之间的差异? 一方面, 部长提出私立教育机构应当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复制”公立机构, 同时需要创造更多的新项目, 这样可能直接造成跨部门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 鉴于革命倡导平等, 而私立高等学校中大多学生属于特权阶层, 因此制定相关升学制度不可避免, 学费亦不可上调。目前已有相关政策, 用于遏制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 此类私立学校通常与穆巴拉克政府时期的商业勾结有关。新部长再次强调, 应鼓励扩大非营利性私立大学。适当扩大私立教育就要求制定相关政策, 包括明确其在大学机构中的份额。

除了规范制度, 影响私立高等教育未来的还有其他因素。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 却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差距, 新的政策是否会远离资本主义的道路? 经济是否会复苏, 是否会为私立高等教育带来发展扩大的光明? 经济的不确定性又会否抹杀私立教育的发展前途?

注:《国际高等教育》杂志每期都会有部分文章选自“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the 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项目研究基地位于奥尔巴尼市纽约大学, 详情请参考 <http://www.albany.edu/>。

## 国际化新时代下的非洲合作关系

Damtew Teferra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 (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 ) 创始人

电子邮箱: teferra@bc.edu

当今, 合作已经成为振兴非洲高等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 也是教育行业的响亮口号。毫无疑问, 由于历史因素和发展道路, 非洲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国际问题。因此, 这种发展方式也在预料之中。本文将基于非洲高等教育合作关系近来的发展和过去的经历, 对目前出现的新趋势加以分析, 探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高等教育合作市场

随着冷战时期各国敌对状态的结束, 非洲一度被认为不再具有吸引力。但近 20 年来非洲经济、政治的发展证明了这种预测的不可靠。无论是传统大国, 还是新兴势力都在重新考虑与非洲的合作。

在这种大背景下, 非洲的高等教育同样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包括欧盟、美国、加拿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参与了这方面的合作。

非美高等教育合作 ( Africa-US higher education initiative): 2007 年 7 月, 来自美国和非洲的一些大学共同发出合作倡议, 旨在加强非洲高等教育在优先发展领域的贡献。2010 年美国综合拨款法案为这次合作拨款 1.5 亿美元 (请见 <http://www.aplu.org>)。

加非高等教育合作 ( Canada-Africa 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hip): 非洲大学联盟 ( 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 与加拿大大学联盟 ( the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 合作提出 “加强非洲高

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关系” ( Strengthening higher Education Stakeholder Relations in Africa ) 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三个部分组成: 扩大大学的服务范围, 密切大学与产业的联系, 以及加强与加拿大大学联盟合作的非洲大学联盟的利益相关者关系 ( 请见 <http://www.aau.org> )。

非洲南部与北欧的合作 ( Southern Africa-Nordic partnership): 非洲南部国家和北欧大学之间的合作 ( Southern African countries and Nordic university cooperation, 简称 SANORD ) 是指来自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等 25 家以科研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来自马拉维、南非和赞比亚的相关机构的合作。目的是促进北欧国家与非洲南部地区的学术机构的多边合作, 应对创新和发展的挑战 (请见 <http://sanord.uwc.ac.za/>)。

欧盟与非盟高等教育合作 ( European Union-African Union partn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欧盟 ( the European Union ) 和非盟 ( the African Union ) 以促进非洲高等教育发展为目的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间流动计划, 现称为尼雷尔综合奖学金计划 ( the Nyrere Consolidated Scholarship Program ), 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及太平洋地区学术交流计划 ( the Intra-ACP Mobility Scheme ), 以及泛非洲大学倡议 ( the PanAfrican University Initiative )。

斯堪的纳维亚合作关系 ( Scandinavian partnerships): 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大学之间

的合作可以说是最持久，最有效的合作。特别是挪威和瑞典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即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放弃了对于非洲高等教育的资助的时候也毫不例外。据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关于挪威对于非洲高等教育的帮助的国家研讨会统计，挪威拨款总数超过7.5亿克朗。

德国学术交流服务 (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 20多年来，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在非洲大学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35个以上的合作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还有非洲大学参与的5个新的非洲示范中心和5个新的国际示范中心。新的合作方式有利于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与非洲大学联盟的合作发展有质量保证体系 (请见 <http://www.daad.de>)。

## 传统合作者

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兴趣，非洲和它的传统合作者建立了很多合作项目。包括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和发展研究合作项目 (the Austrian Partnership Program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大学委员会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the University Commission for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爱尔兰与非洲有关研究能力的合作 (the Irish African Partnership for Research Capacity Building)、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组织 (the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以及英国与非洲教育合作组织 (the United Kingdom's Education Partnerships for Africa)。

## 新兴伙伴关系

巴西、中国、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政治力量也参与到了非洲大学发展和能力建设的努力中来。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在退出非洲教育20年之后，又重新回归。非洲的经济支

柱南非也一直积极发展同非洲其他各国的合作。

## 能力建设的国际化

毋庸置疑，合作对于教学和科研能力建设举足轻重。合作研究在培养科研能力、形成研究文化、推进前沿知识和标杆质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起来的长期合作关系已经显露成效。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由瑞典国际开发署 (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和比利时弗拉芒校际开发合作 (the Flemish Inter-University Council-University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支持的校际合作成果显著：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研究生，发展了许多项目，夯实了非洲有关方面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得到挪威支持的坦桑尼亚也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长期合作带来的资金、后援资助和人力资源，这些成果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 去糟取精

当涉及到大学合作下的能力建设时，非洲发展中国家 (即南半球国家) 的合作一方会是主要的 (如果不是唯一的) 受益者。而且他们本身也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当他们的利益还没有明确的显现出来的时候，发达国家 (即北半球国家) 合作一方也会从合作关系中受益。

即使不考虑直接的显性利益，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会成为发达国家及其机构的知识资本。在当今全球化影响下，世界即为本土，本土即为世界，我们不能低估和忽视从合作中产生的共同利益。

高等教育合作关系的范围和形式是多样化的，但是这些合作并不都是成功和有效的。在一些合作案例中，由于种种原因合作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些原因包括缺少

资金来源、后援支持薄弱、计划不合理、执行不到位、政策拖沓、指导繁琐、领导不稳定和后续不连贯。

## 结论

随着高等教育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显现，双边和多边制度、相关机构和其他发展伙伴都将支持教育行业的发展，尽管2010年的《非洲委员会的报告》(African Commission Report)显示这种支持热情还非常有限。然而，竞争性资助议程的普遍发展、可持续性的缺乏、资助来源的不可预测、协调不力和管理

不善仍然是阻碍这种发展的因素。

机构合作的增加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机构资源(包括时间、资金与基础建设等)和机构动向(包括连贯、互补和优先等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相对缺乏合作机构的国家和希望吸引更多发展支持的地区而言。

最后，合作市场在北半球和南半球博识的、负责的、务实的利益相关者指导下建立，是十分必要的。最终，在与非洲各国的合作中获得持续的影响力和有意义的成果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最大共同利益所在。

## 非洲研究网络的价值

Piyushi Kotecha

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the Southern African Regional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piyushi@sarua.org

围绕着非洲南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许多讨论促进了其知识型经济的发展。然而,参与当今的全球经济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投入能力以及可以创造知识、运用知识和分享知识的体系。

过去的三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使得其15个成员国以及他们的研究教育机构向发展知识型经济的目标又近一步。但是,如果没有通力支持建设连接各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科研教育网络,那么摆在眼前的科技发展大好机遇也不可能实现。

### 连接:近期的发展

2007年底,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15个成员国中只有安哥拉、南非和毛里求斯三个国家具有被称为“SAT3/SAFE”的单一的国际海底光缆。大多数成员国的国际频带宽度低于每秒100兆位。像马拉维、赞比亚、津巴布韦这样的内陆国家和马达加斯加这样的岛国根本没有外部光纤连接。

到2010年,本地区已经覆盖3个海底网络并且有可能从较低的连接成本中获利。除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外,所有国家均已具备连接周边国家甚至是世界的高容量光纤。所有国家的国际光纤连接都大于每秒100兆位,南非更是达到几千兆位,居非洲第一。

未来的发展趋势非常乐观:到2012年,预计所有的成员国都将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

拥有至少两个网络的光纤连接,整个地区也将通过至少6条海底电缆与欧洲建立连接。

从广义上讲,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就意味着大学和研究人員能够更加具备接触全球研究设备的能力,具备能够与非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合作的能力,具备能够开展复杂研究的能力,以及具备更重要的能够建立、储存和分享自己的知识库的能力。特别是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这种趋势为各成员国提供了接触新兴地区研究设备和利用在南非建立的高性能计算设备的机会。

如果没有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目前席卷整个非洲的通讯自由化也很难取得成效。

### 网络:国家和地区的资产

对欧洲的研究证明,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是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国有资产(<http://www.serenate.org/publications/d21-serenate.pdf>)。它们不仅是创新的根本源泉,使研究人员从事复杂的研究成为可能,而且提供了快速广泛的向社会和工业的技术传递,发挥理论研究的潜力,产生社会效益和商业应用。这些网络被认为是重要的国有资产,支持各个领域的研究,创新和合作,为教育、健康、环境和气候、生物技术和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的知识生产和进步做出贡献。

从地区上来说,这些网络不仅通过连接不同国家的学校和研究人員促进学术和研究项目的发展,而且是调节经济的有力手段。

如邓肯·马丁 (Duncan Martin) 在 2010 年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的报告中所说, 特别是在通讯成本还相对较高的非洲, 这些网络很有可能成为一个 (教育) 机构购买力的非营利性的聚合者。他还提到, 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成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并发展自己的基础设施, 那么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就能够以低成本提供更多、更广范围的宽带服务, 在经济上更加划算。

在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 利用有利的政策环境, 投入设备和资源, 以期建设一个高效、高速、相互连接的区域网络, 使得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从中获利。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面临的挑战

欧洲、北美、亚洲 (在很大程度上)、拉美和北部非洲的所有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但是,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区域却远远落在了后面。只有南非和马拉维两个国家拥有功能网络, 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网络仅在建设中。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有限的国家电信设施到薄弱的校园基础设施。此外, 缺少建立研究网络相关的连贯政策、策略和计划, 以及促进跨境连接的国家监管框架, 也是面临的主要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则是另一个挑战。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各个成员国需要加大投入, 促进每个国家的网络建设, 使得利益相关者集中精力通过发展区域网络推进跨境连接。

## 政府领导作用的重要性

研究证明, 在发达国家高速连接的学术研究网络是政府直接参与和支持的产物。由南非政府资助建立的南非国家研究网络拥有千兆位学术和研究的高速连接, 显示了前瞻性领导思维与创新相结合的可能性。这个网络已经连接了南非豪登市的主要大学, 加速了前沿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其他的发展也成为非洲区域网络发展和新生的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运作的潜在动力。这些进展包括建立研究和教育网络联盟, 已被欧盟确认为区域研究和教育网络一个可能的运营方。此网络联盟包含了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研究和教育网络的跨境连接。同时, 西部和北部非洲的研究教育网络也已经形成。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欧盟最近通过“非洲连接项目”(the AfricaConnect Project) 为非洲研究和教育网络的运行提供启动资金。非洲连接项目是一项削减贫困计划, 目的在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潜力使非洲地区得到持续的发展。

## 未来出路

理论上, 区域网络的发展应作为更为广泛的高等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跨国区域项目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有前景且范围广泛的项目不仅需要来自国家政府的支持和投资, 也需要私人部门、慈善团体以及区域高等教育界自身的支持和投入。只有充分调动这些参与者的积极性, 本地区才有可能朝着实现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的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

## 非洲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国际经验

Pundy Pillay

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 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 南非总统府政策部部长

电子邮箱: pillayp@mweb.co.za、pundy.pillay@wits.ac.za

决策者能够从芬兰、韩国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中获得怎样的经验? 本文主张非洲国家应该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和教育规划、高品质的学校教育、体制的分化、政府的作用、区域发展、合作与网络。

### 经济和教育规划

上述三个体系展示了保持经济和教育规划之间密切联系的益处。在芬兰, 决策的重点放在发展知识型经济。在韩国, 政府是促进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的绝对干预者。北卡罗莱纳州的教育或经济领域不具有正式的州政府导向型规划。但是, 州政府的教育与经济机构, 私营商业部门与公共高等教育机构等之间, 都存在紧密的联系, 这样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以及更广泛的发展所需的教育、培训, 以及研究和创新的目标。

### 高品质的学校教育

芬兰和韩国两种模式都表明高品质的学校教育在发展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与之不同的是, 北卡罗莱纳州的学校教育(和高等教育)品质有很大地区差异。

### 体制的分化

高等教育的二元体制符合国家的发展目标, 并且已经在这三个体系中有不同程度的

发展。在芬兰, 两个高等教育部门从根本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韩国, 专科院校与大学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在北卡罗莱纳州, 高等教育机构, 包括大学和社区学院, 存在一定的差异, 以满足人口和经济不同的需求。然而, 大学部门内部的差别不大, 它们都渴望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

### 政府的作用

在芬兰, 政府发挥作用, 特别是在资金方面, 保障高等教育系统朝着适合国家需求的方向发展。在韩国, 政府在学校教育系统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而高等教育则很大程度上由私立院校提供。在北卡罗莱纳州, 州政府更多是担任推动者和可靠的资金来源, 推进私营商业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的重要合作关系。

### 区域发展

在芬兰, 遍布全国的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以及与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 以保证区域发展的更大权益。韩国现在把通过这些相关举措而进行的区域发展称为“新大学区域创新”(the New University for Regional Innovation)。

### 合作与网络

芬兰系统的特点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利

益相关者之间发展高层次的共识建立和合作关系，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机构、政府、公共资助机构和私营部门等。这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以及促进适当教育和研究成果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韩国，政府在教育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发挥“有形”的调控作用，包括对于私营部门的监督。历史上，相关政府部门、公立研究机构与具有相当规模的研发私营公司之间建立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网络。如今，随着研究和发展能力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大学，特别是大的公共机构已经成为其中的第四股重要力量。

北卡莱罗纳州案例研究说明了应怎样发展高等教育系统与政府、私营商业部门以及民间团体的有效合作，以求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这些合作关系虽然并没有被立法规定，但是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综上，基于几点重要的原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决策者应该特别注意高等教育发展与总体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联。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毋庸置疑。通过教育和培训以及研究功能，高等教育能够帮助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率，同时增加其在知识型经济中的参与度。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非洲国

家无需仅仅依赖于初级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生产，这些生产技能由小学和中学教育提供即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的国家同样可以选择生产可增值的商品和提供可增值的服务，这些技能培训则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后一种策略的优势在于它可以更快的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使政府也能为陷于贫困线生活的人们提供范围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服务。

发展中国家怎样摒弃传统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和印度是当今最好的例子。为了使国家在其境内获得发展知识经济所需的重要组成，就需要发展有效的高等教育系统。显然，这会受到资源短缺和资源行业间竞争（如学校教育、健康等问题）的限制。

## 结论

从发展的角度看，非洲决策者重视高等教育十分必要。关于这点，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1）扩大就学机会，提高教育质量；（2）加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3）确保明确的体制分化，优化利用有限的资源，有效实现发展目标；（4）致力于发展一个公平的教育体系，不受限于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宗教等因素。

## 谁从免费高等教育中受益？

David Post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 教育政策系教授、《比较教育评论》  
(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 编辑

电子邮件: post@psu.edu

谁从“免费”高等教育中受益？这可能是一个敏感问题。结构调整和世界银行的有条件贷款迫使许多国家重新将国家财政投入放在公共产品 ( public goods ) 上，而且许多公共补贴的支持者也提出一些以社会公平为中心的问题。大学补贴的确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溢出效益，例如在民权、社会信任、艺术文化以及本土相关研究方面等。但是一个难以绕过的经验问题在于：哪一类学生会在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最受益于高等教育补贴？

厄瓜多尔已经成为利用高等教育转变几十年种族和社会不平等的最新试验场。2008年，该国实施了新的《宪法》，要求免除所有公立学校的费用，其中包括公立大学。维护社会平等是大学教育“免费”的主要原因。但是试验的初步结果并没有令人兴奋鼓舞：到目前为止，因免除学费而受益最多的群体是那些已经占据社会有利地位的以及可能获得社会有利地位的人。

### 家庭承担大学教育的全部开销

原因不难被看穿。在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很多地方，人们都很向往大学教育，这种向往并不因为收费而减弱。在2009年以前的厄瓜多尔，大学收费尤其不是进入公立大学就读的障碍，因为当时大学将收费和学生的家庭收入挂钩。家庭的<sup>最大</sup>开销不是直接的学

费，而是为了鼓励学生学习、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牺牲的时间，这些时间家人本可以去工作补贴家用。近年来，尽管80%的适龄人口都进入了中等学校学习，但是穷人的辍学率很高。仅有一半的适龄学生完成了中等教育并有资格接受“免费”的大学教育。

厄瓜多尔公立大学的学生费用减免体现了2008年《宪法》的精神。《宪法》的第356条这样说 ( 非官方翻译 )：

“公立高等教育在整个本科阶段都实行免费教育。公立高校的录取将由一套依法制定的评估系统进行规范化操作……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要保证入学机会公平以及学生在学、转学、毕业期间的公平，但是私立高等教育可以收取费用。”

公共政策中传达的美好心愿是复杂的、理想化的，却常常造成意料之外的结果。

### 数据一瞥

根据厄瓜多尔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以及新近的全国家庭就业的抽样调查结果，种族、收入和语言不同的各族群之间在入学机会上的差距不断拉大。例如，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那一代人中，上大学的“黑人”比例只有5%左右，上大学的“土著”比例只有8%，“混血儿”20%、“白人”25%。到目前为止，具体差距还没有准确的测量结果，但令人担忧的是差距似乎在拉大。宪法中规

定公立高等教育必须免除学生的直接成本，就是为了扭转这一趋势。

尽管目标很好，但将免学费政策实施一年后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后，人们可以看到厄瓜多尔公立大学的入学机会差距反而在扩大，即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和普通阶层之间的入学率差距在不断拉大。

分析结果可以总结成两点。第一，孩子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取决于父母亲的语言。2007年（宪法改革之前）、2008年（改革当年）和2009年（改革之后）的调查中，厄瓜多尔说不同语言的族群在入学机会统计上有很高的区分度。2007年，说土著语言的大学适龄青少年中只有4%入学，在“免费”政策下这一比例到2009年只涨到5%；相反，父母只说西班牙语的大学适龄青少年中2007年有3%入学，2009年这一比例增加到17%。结果，现在族群之间的差距比2007年还大。第二，入学机会与家庭经济情况有关。厄瓜多尔有一个复杂的收入和家庭福利度量标准，该标准用于决定哪些家庭有资格领取每月38美元的补贴。从2007~2009年，母亲领取“人类发展债券”（Human Development Bond）资助的家庭中，青少年的大学入学率从4%增加到7%。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2008年以后最受益的群体并不是这些穷人。没有领取“人类发展债券”资助的家庭中，青少年的大学入学率增长更快，从16%增加到24%。这再一次表明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孩

子之间的差距变大了。

## 减少机会差距

那些更可能放弃就业并完成中等教育的孩子来自父母不说土著语言的家庭，他们一般是混血儿或白人，他们的父辈来自收入更高的阶层，其母亲的教育程度也较高。因此，除非小学和中学教育能有所改善，允许更多占劣势地位的孩子进入高等教育，不然“免费”大学教育的受益者一定是厄瓜多尔更占社会优势地位的人群。那么，厄瓜多尔应该怎样做才能促进机会均等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厄瓜多尔要投资改善基础教育的质量，控制在校生的辍学率，让他们能够读大学。事实上，这是《宪法》改革应该能够做到的，因为除了免费的公立大学之外，《宪法》也免除了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的教育费用。如果现在政府能够改善小学和中学教育的质量，更多来自贫困家庭或是“土著”家庭的孩子将能顺利毕业。最终，他们将能够受益于免费公立高等教育。但是，如果学生费用免除，改善基础教育的钱应该从哪里来？减免所有大学在校生的费用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并迫使其将可能用于改善基础教育的钱花在高等教育上。为了避免这种不当的结果，厄瓜多尔应该建设一个透明的、以需求为基础的财政资助体制，只为那些不能负担费用的学生支付费用，而不是继续对占最优势地位的人口进行补贴。

## 厄瓜多尔的“免费”公立大学：过于乐观？

Mateo Estrella

厄瓜多尔昆卡大学 (the Universidad de Cuenca) 院长

电子邮件: mateo.estrella@ucuenca.edu.ec

许多观察家可能会嫉妒厄瓜多尔的公立大学。厄瓜多尔实行了 2008 年《宪法》，这项法令免除了所有学生的费用。但是，厄瓜多尔全国 25 所公立大学现在处于一个奇怪的位置，免费教育似乎被过于强调了。在世界其他地方，公立大学的支持者哀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趋势，谴责政府财政拨款缩水。而厄瓜多尔的高等教育即将看清大学在压力之下新近实施的改革是否仍可能问题重重。尤其，有些人担心大学自治受到威胁。厄瓜多尔的高等教育体制仍然处在巩固和提高的过程中，而本文试图审视其在受到总统倡议和立法举措的影响下走向何方。

### 自治、市场和 2008 年《宪法》

厄瓜多尔的第一项《高等教育法案》(Law of Higher Education) 可以上溯到 1938 年，该法案规定了大学共同治理、学术自由以及自治等相关条款。1946、1982 和 1990 年的法案修订逐步建立了高等教育体制，其中包括高校系统的自治原则。整个法案体制也涉及了中央政府的年度预算分配方案。但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自治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批评者反对远离国家发展规划的高等教育发展。

2007 年，Rafael Correa 作为厄瓜多尔政坛的“局外人”成为总统，这要感谢公众对于体制改革的广泛支持。Correa 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获得博

士学位，是美国旧金山大学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这所私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2005 年，他被任命为厄瓜多尔经济部长。在他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中，他把自己定位为具有大学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

Correa 总统面临的高等教育困局与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一样。在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几十年发展，特别是私立高等教育，都是无序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未成为政府领导人塑造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以及保护其政治权利的工具。2007 年，当 Correa 总统赢得总统竞选时，他提出了“公民革命” (Citizen's Revolution) 的口号，这个理念受到“21 世纪的社会主义” (Soci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启发。他的建议之一就是召开宪法会议制定新《宪法》，而这项新《宪法》随后通过了国家公投。

### 政府以补贴换来质量控制

2008 年，《宪法》提出了多项改革：扩大总统权力，改革土地租权、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关于传播媒介的法令。但是，有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许多重要改革中，最昂贵的是高等教育改革。

到 2008 年之前，厄瓜多尔 25 所公立大学的学费比该国 38 所私立大学要低得多。2008 年，具体收取数额根据学生的家庭收入而制定，多数公立大学的最高学费是 800 美元。尽管学费相对较少，但这些学费收入覆

盖了很大一部分学校预算。这些学费也满足了开设学生所需特殊课程的需求，并补足了大学经费。但是从2009年初开始，《宪法》就免除了公立大学学生的学费。现在，公立大学几乎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年度拨款和补贴，这直接导致大学制定了无视学生规模 and 需求的预算规划。到目前为止，厄瓜多尔还没有将学生数量和拨款直接挂钩，未来是不是会根据学生数量的增长提高拨款额度也不清楚。

### 悬而未决：即将登场的高等教育规划师

根据2010年的法律，厄瓜多尔组建了一个以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和创新为中心的秘书处。在高等教育摆脱了政治权力、实现自治的国家，这类机构是一个富有创新内涵的组织。高等教育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以及大学要对中央行政机关进行汇报的需求将大学与过去的自治割裂开来。新的秘书处负有管理公立大学财政拨款的职责，以及将高等教育纳入国家计划的责任。

### 政府统管财政的危险

尽管政府直接控制高等教育的规划和拨款有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公立大学普遍对未来感到困惑。问题之一就是厄瓜多尔的研究生教育。现在所有新项目的批准都需要高等教育部经手，因此新的研究生项目批准程序被拖延了。另一个问题是秘书处和大学的日常关系，特别是在财政稳定性方面。目前需要对怎样克服免费教育带来的预算限制采取替代措施。尽管“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拒绝了市场导向的招生模式，但是政府采用的标准决定着什么样的学生能在一些学校

获得全额资助，以及哪些项目能扩招或关闭，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还不明晰。自然而然的，政府想把这些基本的而且相当昂贵的决定与国家发展计划、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放在一起。最终，大学几乎没有能力为校舍、设备和实验室的建设和更新进行规划。

### 最后的告诫：私立大学

在厄瓜多尔，私立大学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几所大学运行效率非常高。但是，也有很多大学只是文凭工厂，做一些“表面功夫”。在最新的官方认证中，水平最高的11所大学中有7所公立大学和4所私立大学；相反，水平最低的26所大学中，公立大学只有2所，其他都是私立大学。

顶尖私立大学的未来取决于他们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没有公立大学那样的预算制约。他们创造了市场压力和机会，并在市场中占得先机，因此他们正在推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走出政府控制。

如果公立高等教育的质量因为经费减少而下滑，中产阶级可能会从公立大学中退出，就好像他们已经退出公立小学一样。如果那样的话，全盘财政管理中的讨价还价将对厄瓜多尔在一些教育领域的投资能力产生严重的限制。

厄瓜多尔的高等教育在《宪法》改革之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系统，这个系统需要变革。然而，该国的大学教育规划缺乏整体性的视野。“免费”的公立教育不能帮助教育机构转型，也不能把研究和国家发展这样的理念注入到大学使命中来。

## 亚美尼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

Arthur M. Hauptman、Levon Barkhudaryan、Sergey Balasanyan

Arthur Hauptman: 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公共政策咨询专家

电子邮箱: hauptman\_a@yahoo.com

Levon Barkhudaryan: 亚美尼亚国立经济大学 (the Armenian State Economic University) 副校长

Sergey Balasanyan: 教育财政专家、高等教育财政战略准备组织成员

为了解亚美尼亚目前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我们必须首先回顾该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与苏联体制的决裂时期。当时,亚美尼亚新政府采取了多项教育改革措施,包括高等教育。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改革涵盖公共经费分配以整笔款项形式进行,取代了曾经的分项预算。此外,2004年的立法为亚美尼亚的大学在日常管理运行中争取到了更多自治权。

过去20年的几个发展趋势刺激了改革。公立大学的学生入学数量从2003年开始大幅增长。但是,这部分增长的学生都是付费学生,而享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数量几乎没怎么变。现在学费收入已经占亚美尼亚公立高等教育经费的80%。这一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公共部门进行新的财政战略变革的动机所在。

### 目前的财政结构

亚美尼亚的拨款模式与前苏联国家相似,有两个特点:以配额为基础实施的双轨制学费和公共资源分配制。配额是指由政府决定国家每年需要的专业人才数量,并且通过大学为此提供奖学金。政府提供的奖学金额度以规范成本核算,其标准一般低于生均经费。这也是为什么学生的学费要被用于补贴奖学金获得者并成为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

尽管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但是国家对高

等教育的实际拨款和生均额度却逐年降低。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由于公共部门拨款不足以及有效质量保障措施缺位,教学和研究的质量已经大幅下滑。

### 主要的问题和挑战

和许多国家一样,亚美尼亚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高等教育入学率不充裕、入学机会不公平、质量低下、与就业市场脱节以及产出水平低。

入学率不充裕、入学机会不公平: 尽管近年来亚美尼亚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数量快速增长,但高等教育入学率仍大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此外,入学机会也不公平。低收入学生和农村学生的入学机会远低于那些来自富有家庭的学生和城市学生。

质量低下、与就业市场脱节: 造成亚美尼亚高等教育质量低下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当前亚美尼亚的质量保障评估程序并未按照欧洲认定的标准进行。另外,校园里腐败丛生。与就业市场脱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就业环境和毕业生的工作预期都有所改善,但毕业生与人才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也很明显。大学毕业生中,只有不到1/3的找到工作,而他们的工资也只略高于那些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工作者。

产出水平低: 亚美尼亚高等教育生师比的

统计数字令人震惊,略低于 10:1,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平均数的 2/3 还要低。对学生/教学人员以及学生/非教学人员的比值和学费的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呈负相关。

## 设计财政战略

为了迎接这些挑战,亚美尼亚正在制定一个高等教育财政战略。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入学率、减少不平等、改善质量、减少与就业市场的脱节、提高整体的产出,以及与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更一致。

以绩效为基础对高校进行拨款:建立一个更现代的、基于产出的拨款体制是一项重要改革。在这个体制中,政府每年应按照学位毕业生的数量对公立和私立院校进行拨款。为使之更有效,拨款数额会按照修订过的成本规范计量,从而更准确地反映现在和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此外,需要遵照质量保障规定以及博洛尼亚进程的规范授予学位。

以成绩和需求为基础为学生提供奖学金:为了提高新的绩效体制的效率,当前的奖学金制度会被一个以成绩和需求为基础的新体制所取代。这一新体制可能规定了拿奖学金的成绩标准和需求标准,以及可验证的家庭贫困认定标准。

学生贷款:一个常用于增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工具就是学生贷款。在亚美尼亚,一个以硕士学位学生为主的试点项目可能成为新的财政体制改革的先行部分。

有竞争力的创新经费:为了鼓励大学提高

教学质量和实施创新,政府计划创立一个竞争性经费。

对资本性支出进行财政管理:目前,学生的学费是大学资本支出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是亚美尼亚财政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现在学生所支付的学费是为未来学生福利的全额支出。因此,政府应该建立资本预算或者允许大学借贷,以进行资本管理。

加强质量保障:在意识到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性以后,亚美尼亚建立了一个质量保障中心,以发展并核准质量保障标准和指导原则。有人提议,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都要经受国家专业教育质量保障中心的认证。此外,未来将努力减少校园腐败行为,并要求院校为认证提供更多数据。

将科学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当前亚美尼亚高等教育体系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大多数科学研究是在单独的研究所里做出来的,这就阻碍了很多大学,使其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通过结合科研和教学进行质量改进的途径之一是要求研究所与大学合作以得到公共拨款。

鼓励引入更多的私人投资:为了从私营部门吸引更大的财政支持,有人提议让私立院校也有资格按照绩效接受政府拨款和政府奖学金,以及享受其它的免税政策。此外,减税鼓励会帮助企业为大学捐奖学金、建设图书馆和资助大学研究。

这些改革的目的是让亚美尼亚高等教育摒弃过时无效的政策,采纳顺应国际趋势的政策。

## 中国的学生事务发展

Karen D. Arnold、朱红

Karen D. Arnold: 美国波士顿学院高等教育学副教授

电子邮件: karen.arnold@bc.edu

朱红: 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 hongzhu@pku.edu.cn

过去30年里,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地从精英教育体制转型为大众教育体制。学生数量明显增多,学生来源越发多元化,高等教育也采用了市场规律。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学生事务(student affairs)管理开始演变出新的形式。心理和性格发展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的框架下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的一部分。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未来的大学生为国家发展做准备并维持社会稳定。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所有学科的本科生和硕士必须修读一些政治理论和历史课程,还通过诸如大学学生会这样的机构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学生的课外活动和学生治理之中。从组织角度看,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处于每个院校的中国共产党党委领导下,在大学、学校和院系层面的官僚机构中都有相关职员和项目。

2004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这份文件要求大学建立专业的学生事务管理队伍,加强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其中,学生发展的内容是指对学生进行政治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以服务国家发展。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一致。

然而,此文件的出台并非巧合。当时,

国内已面临一系列的压力,要求在青年人人才培养方面对旧式的灌输模式进行改革,并将学生服务(student service)管理列为重点关注问题。在这些压力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扩招十分成功,但在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下,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升,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也使其非常不满。

### 学生事务所为何?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为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向大学在校生收取学费并终止了毕业包分配的政策。毕业后学生需自行求职的要求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许多毕业生对自己将来的职业发展并不明确,他们的能力也不足以在心仪的地域找到工作。高考的竞争已经给中国年轻人带来很大压力,而学生在校期间面临不断的竞争以及对未来职业预期的不确定又成为新问题。大量失业和待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威胁到了社会稳定。由于学生常常不能就读他们心仪的专业,并且几乎不能换专业,这就导致学生在选择职业规划道路时也变得有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也成为当下学生问题的诱因之一。对父母亲来说,家庭地位和家长退休后的生活都落在一个孩子身上。这一代独生子女总是被宠爱着、被保护着,几乎没有面对过不确定性和挫折

问题；他们在这些压力面前可能特别缺乏承受能力。学生也无法转向教授寻求个人支持；中国新近的几个实证研究显示，学生和教师在课外几乎没有任何互动。

已有证明，现有的大学组织和管理结构在处理竞争、不确定性以及不稳定性相互交织的问题上是不平等的。学术欺诈风行；学生自杀数量大幅增加；学生暴力事件也在上升；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得不到处理；尽管大学已经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改善，但学生宿舍紧张仍然是一个问题；学生对大学教学和课外活动设施很不满；校园中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的歧视也在升温。

为了回应这些严重的学生问题并遵循政府政策规定，中国各地的大学正在新建和重组非学术性的学生服务管理，包括职业辅导、心理健康咨询以及财政资助咨询等。大学已经成立了相关的硕士和博士教育项目来培训学生事务管理人员。高等教育学者也开始开展相关的大学政策研究。例如，清华大学对一些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学生体验调查；北京大学也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研究项目，将对北京所有部属高校的学生参与情况进行研究。中国学生事务的学术研究很少，但数量正在上升，这些文章都指出培训缺乏标准、不规范、专业化程度低、缺乏理论基础、学生事务地位低等都是如今面临的问题。

## 潜在的方向

在中国发展学生事务的源动力很明显。但是，在早期发展阶段，很难知道学生事务发展的态势如何。从结构上看，当前的管理体制有两个不同的分支。学生事务单位负责学生事务，它处于综合管理分支的下位。学生发展单位，例如思想政治道德建设，由大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委组织。这两个不同单

位的合作方式将在学生事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从观念上看，学生事务的发展轨迹取决于三个不同的方面。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政府需要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方面强调组织方向和学生指导。中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和高等教育学者也在研究学生事务的成熟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学生事务应该作为学生管理、学生服务还是学生发展建立起来？这是一个基本问题。第三个方面需要考虑并将重心聚焦在如何发挥学校领导者的创新思维能力以及如何将通识教育改革融入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中来。如果将这三方面的考量融合在一起，以此来设立学生事务框架，那么学生事务管理就能以社会和学生为中心，考虑全面的学生发展，并将学术与非学术的学生经历联系在一起。相反，如果这三个方面分开处理，那么学生事务就可能发展为一种管理功能，不能全面兼顾到学生，也没有连贯的哲学思考。

似乎越来越多的大学将建立高等教育管理和学生事务的专业研究生学位。学生事务的职员也会继续扩充队伍，特别是在就业指导和学生支持领域。相关学生经历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学生事务专业人员和组织结构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多。中国政府将观察顶尖大学中通识教育和住宿教育（residentially based education）试点结果，并推广成功经验。在学生事务地位和形式都不断变化的时期，很自然地会出现很多较为模糊不定的概念界定、管理模式、专业职能等。

## 优势与挑战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学生同住同学的模式。其它已有的培养团体和学生学习的结构模式包括：辅导员、院系、共

青团组织的社会活动以及发展领导能力的活动等。中国将需要发展自己的学生事务的理论基础和专业规范。大学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学生支持和学生全面发展（holistic development）模式。同时，中国也需要更多关于大学实践活动和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学生学习经历的研究。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其对高等教

育质量的重视可能会导致院校在学生学习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发生变革调整。政府最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强调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类官方文件以及研究项目和大学实践努力等，都代表了中国学生发展变革的方向，而其发展模式仍在成型中。

## 新书推介

Albornoz, Orlando. *Breves Notas sobre la Autonomía y la Libertad Académica* [Brief Notes on Autonomy and Academic Freedom]. Caracas, Venezuel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2009. 297 pp. (pb). ISBN 980-00-2592-5.

过去几年中, 委内瑞拉政府多次尝试向大学自治让步。作者 Albornoz 站在批判查韦斯政府 (the Hugo Chavez government) 的立场上, 讨论了委内瑞拉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复杂的话题。全书是三部曲之一, 共 20 章, 从历史的角度和国际比较的视角进行了论述。书中, Albornoz 引用了他与教授、研究人员和院校领导人 (正、副校长) 的对话, 以及有关委内瑞拉高等教育的一手资料。该书还分析了委内瑞拉高等教育所处的政治环境, 阐述了作者对公共政策实施的洞见。

Arum, Richard, and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11. 259 pp. ISBN 978-0-226-02856-9.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http://www.press.uchicago.edu).

在这本很有影响力却有所争议的书中, 几位作者提出, 美国多数院校的学生没有全力投入学习。该书使用了本科学习评价 (the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的数据进行分析, 即对学生第一学期和二年级末学业成绩进行评价, 认为学生在学术能力、批判思考和相关主题上几乎没有进步。

Bader, John B. *Dean's List: 11 Habits of*

*Highly Successful College Studen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1. 269 pp. ISBN 978-0-4214-0081-5.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本书以美国那些威望甚高的院校为焦点, 指出了影响本科生成功的因素。作者 Bader 是一位本科生院院长, 和他一起完成这项研究的同事来自十几所院校。他在书中写下了重要的管理知识。他的学习“习惯”包括: 关注学习而不是分数, 享受课程的盛宴, 理解专业不是职业, 工作要聪明而不只是努力, 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学生, 那些负责本科教育的人士也会感兴趣的。

Bank, Barbara J., ed. *Gender and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1. 434 pp. ISBN 978-0-8018-9782-5.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本书用 50 个章节对美国性别和高等教育的调查进行了最新分析。书中关注的主题有男女合校的院校、社区学院、自由女性主义、大学学生发展、酷儿理论、管理领导力类型、学生权力、体育运动、女生联谊会等, 内容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

Barratt, Will. *Social Class on Campus: Theories and Manifestations*. Sterling, VA: Stylus, 2010. 238 pp. ISBN 978-157-9225728.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http://www.styluspub.com).

本书读者群以学生为主, 以大学校园为焦点, 提供了美国社会阶层的一些基本信息,

从中也可观察校园中社会阶层影响学生和大学的方式。

Beach, J. M. *Gateway to Opportunity?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erling, VA: Stylus, 2011. 192 pp. ISBN 978-1-57922-452-3.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http://www.Styluspub.com).

本书简要论述了美国社区学院的历史,对相关领域进行了文献综述,并讨论了当下加州社区学院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

Bhandari, Rajika, Raisa Belyvina, and Robert Gutierrez, eds. *Student Mobi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rom Six World Regions*.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40 pp. ISBN 978-0-87206-341-9. Web site: [www.iiebooks.org](http://www.iiebooks.org).

本书受国际“图集项目”(Project Atlas)赞助,追踪了国际学生流动的轨迹。书中搜集了世界六大地区17个国家的报告,内容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与17个国家的国际学生数量有关的政策和规划以及这些国家的学生人数。书中披露了最新数据。

Bowen, William G. *Lessons Learned: Reflections of a University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2010. 168 pp. ISBN 978-0-691-14962-2.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作者 William Bowen 是美国最成功的精英大学校长之一,这书记录了他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学到的经验教训。他对教师事务、大学治理、董事会角色、战略决策制定、学

生录取、筹款等话题都有论述。尽管该书反映的是美国经验,但对全世界的研究型大学都会有启发。

Bringle, Robert G., Julie A. Hatcher, and Steven G. Jones, eds. *International Service Learning: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Research*. Sterling, VA: Stylus, 2011. 400 pp. ISBN 978-1-57922-339-7. Web site: [www.styluspub.com](http://www.styluspub.com).

本书提供了有关研究和课程发展的一个框架,并比较了留学、服务学习、国际视野、教学等问题已有的相关研究。本书聚焦于北美学生的国际服务学习体验,但是书的最后四个部分从南非的视角论述了北美的国际服务学习。

Chow, Patricia, and Rajika Bhandari. *Open Doors 2010: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 120 pp. ISBN 978-0-87206-336-5. Web site: [www.iie.org](http://www.iie.org).

本书对美国的国际交流进行了标准年度数据分析,其中包含来美的国际学生和学者的数量、来源和学习地分布等有用的信息。目前,美国的国际学生比例高达3.5%,数量达到69万。

Clotfelter, Charles T., ed. *American Universities in a Global Market*.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2010. 512 pp. ISBN 978-0-226-11044-8.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http://www.press.uchicago.edu).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本书探讨了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因素以及全球高等教育长远发展的可能趋势。书中的主题包括美

国的国际学生趋势、美国大学的海外项目、中国和印度现在的学术趋势、在美国受训的韩国毕业生的就业类型变化等，为各个主题提供了详细的数据和分析。

Deardorff, Darla K., ed. *The Sage 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9. 542 pp. ISBN 978-1-4129-6045-8. Web site: [www.sagepublications.com](http://www.sagepublications.com).

这本手册对跨文化能力的概念进行了综合深入的思考。第一部分论述了分析框架，后面对概念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更具体的界定与阐述。该领域的知名学者在文章中论述了跨文化能力在不同国家和专业背景下的含义以及该主题作为一个正在开发的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De Wit, Hans. *Trends,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msterdam: Center for Applied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2011. 127 pp. ISBN 978-90-817122-1-7. Orders: [g.konig@hva.nl](mailto:g.konig@hva.nl).

作者 Hans de Wit 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大学 (the 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国际化专业的教授，本书搜集了他的九篇已发表的作品，有些文章是和他人一起合作的。其中四篇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和问题，三篇关于学生流动，一篇关于研究和资源。

Fetters, Michael L., Patricia G. Greene, Mark P. Rice, and John Sibley Butler, eds.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s: Global Practic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0. 203 pp. ISBN 978-1-84980-263-5. Web site: [www.e-elgar.com](http://www.e-elgar.com).

本书搜集了来自四大洲的大学创业生态环境的案例研究，指出了这些项目取得成功的七个因素，包括高层领导的视野、项目组织和教师领导力、长期努力、经费等。

Gallant, Tricia Bertram, ed. *Creating the Ethical Academy: A Systems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Misconduct and Empowering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25 pp. (pb). ISBN 978-0-415-87469-4.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高等教育的行为和伦理问题是学者不愿意考虑的事情，但是这些问题很重要。作者立足于美国，对标准化测试、研究不端、大学治理的伦理困境等主题进行了探讨。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高等教育界道德行为改进的途径和方法。

George, Abraham, ed. *College Autonomy in India: Performance and Prospects*. Delhi: Authors Press, 2011. 308 pp. Rs. 825 (hb). ISBN 978-81-7273-569-2.

本书的目的在于呼吁倡导印度自主学院的合法性与扩张问题。所谓自主学院是指依附于大学但完全独立于大学官僚机构的本科生院。作者认为，学院自治将帮助印度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提升质量和多样性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Harper, Shaun R., and Jerlando F. L. Jackson, eds.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477 pp. ISBN 978-0-415-80326-7.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本书讨论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话题涵盖教师、课程、教学、学生、组织、治理和政策。全书共25章，是以前发表作品的再版。

Hayhoe, Ruth, Jun Li, Jing Lin, and Qiang Zha. *Portraits of 21st Century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483 pp. ISBN 978-988-1785-23-7. Web site: [www.hku.hk/cerc](http://www.hku.hk/cerc).

本书信息量大，主要内容是对中国大学的12个典型案例研究，其中三所是公立综合性大学，三所教学型大学，三所科学技术大学，三所私立大学。此外，作者讨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些共同问题以及“中国大学模式”崛起的可能性。

Hazelkorn, Ellen. *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Battle for World-Class Excellence*. Houndsmill,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59 pp. ISBN 978-0-230-24324-8. Web site: [www.palgrave.com](http://www.palgrave.com)

本书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排名，很有原创性。该书访问了一些国家和高校的大学领导人关于排名的看法、这些排名如何影响学术思维以及大学和政府的政策制定。作者也详细讨论了主要的国际排名使用的方法，以及排名引起的主要争论。

Hermanowicz, Joseph C., ed. *The American Academic Profession: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1. 371 pp. ISBN 978-0-8018-9978-2.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本书作者论述了有关美国教授职位所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及相关思考，是一本发人深省的读物。书中引用的大量资料说明挑战很艰巨。书中涉及的主题有教学改革、未来教师的社会化、研究生教学和辅导的专业化、学术自由和专业自治等。

Kezar, Adrianna, and Cecile Sam. *Understanding the New Majority of Non-Tenure-Track Faculty i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Wiley Periodicals, 2010. 133 pp. ISBN 978-1-1180-0266-7.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http://www.josseybass.com).

美国的大部分大学教师都不再是终身教职系列了，他们是非全职的合同工（常被称为 contingent faculty）。该书讨论了这一新的事实，以及这一事实对大学和教师的影响。该书还为处理这一新问题提供了实践建议。

Macready, Caroline, and Clive Tucker. *Who Goes Where and Why? An Overview and Analysis of Global Educational Mobil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1. 154 pp. ISBN 978-0-87206-342-6. Web site: [www.iiebooks.org](http://www.iiebooks.org).

本书从主办国的角度概述了国际学生的流动情况，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和一些分析。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学生的全球流动，讨论了中等教育和第三级教育的学生流动趋势和原因，简要论述了15个国家的政策和统计数据。第二部分详细论述了美国的情况。

Maranto, Robert, Richard E. Redding, and Frederick M. Hess, eds. *The Politically Correct University: Problems, Scope, and Reforms*.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2009. 326 pp. ISBN: 978-0-8447-4317-2. Web site: [www.aei.org](http://www.aei.org).

本书从保守派角度对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批评。书中分析和讨论了美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保守派占据学校提拔和领导岗位的问题,以及校友和董事会的角色等。这些批评被贴上了“政治正确性”的标签。该书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主要由自由派和左派的意识形态主导。

Mullen, Ann L. *Degrees of Inequality: Culture, Class, and Gender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2011. 248 pp. ISBN 978-0-8018-9770-2. Web site: [www.press.jhu](http://www.press.jhu).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学生怎样思考求学地、教育观念和学习体验。书中对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和南康乃狄克州立大学(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的学生进行了案例研究。书的重点在于理解社会阶层怎样影响学生的决定和体验。作者发现,大学体验倾向于复制社会不平等现象。

Radder, Hans, e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Science and the Modern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 Univ. of Pittsburgh Press, 2010. 360 pp. ISBN 978-0-8229-4396-9. Web site: [www.upress.pitt.edu](http://www.upress.pitt.edu).

本书主要从批判角度考量了科学研究的商品化和道德伦理问题,针对很多主题进行了多层面的讨论。其中,很多作者的文章有

心理学背景。书中的主题包括财政兴趣和科学规范、生物学数据流动的商品化、从大学到工业的知识转移、学术文化的商业化等。

Research Institute on Higher Education, Hiroshima University. *Producing Qualified Graduates and Assuring Education Quality in the Knowledge-Based Society: Roles and Issues of Graduate Education*. Hiroshima, Japan: Research Institute on Higher Education, 2010. 80 pp. ISBN 978-4-902808-59-9.

本书是一个研究生教育论坛的文集。书中分析了全球研究人员和博士生的运动趋势、日本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趋势、中国新近的改革和学生发展以及卓越的研究生教育。

Rhoten, Diana, and Craig Calhoun, eds. *Knowledge Matters: The Public Missio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2011. 560 pp. ISBN 978-0-231-15114-6. Web site: [www.cup.columbia.edu](http://www.cup.columbia.edu).

本书的重点是高等教育和研究型大学的公共责任和角色。该书批评了世界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和市场化。部分章节讨论了公立大学中科学研究所扮演的角色、排名所扮演的扭曲角色、质量保障问题,以及高等教育的全球霸权问题。另外,也有章节把目光放在俄罗斯、几个亚洲国家、非洲、英国以及美国赠地学院因为这些因素受到的影响上。

Ryan, Janette, ed.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1. 261 pp. ISBN 978-0-415-58225-4.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本书讨论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如学生境外求学等。一些章节对澳大利亚、英国等地的中国学生进行了案例研究。该书很关注中国的跨文化教育。有几个章节讨论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际化的影响。

Saarikaillo-Torp, Mila, and Jannecke Wiers-Jennsen, eds. *Nordic Student Abroad: Student Mobility Patterns, Student Support System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Helsinki: Social Insurance Institution of Finland, 2010. 150 pp. ISBN 978 951 669 834 5. Web site: [www.kela.fi/research](http://www.kela.fi/research).

本书详细阐述了北欧国家学生出国留学的案例，这些国家包括冰岛、法罗群岛、丹麦、挪威和芬兰，涉及的问题包括支持服务、经费、人才流失等。

Shattock, Michael. *Managing Successful Universities*, 2nd ed. Maidenhead, UK: Mc-Graw-Hill, 2010. 224 pp. ISBN 978-0-335-23743-2. Web site: [www.openup.co.uk](http://www.openup.co.uk).

这本书是作者之前一本有关大学管理指南的修订本，关注的主题包括成功大学的特点、财务管理、领导力、治理、创业精神、精简等。尽管该书从英国的国情出发，但对国际同行仍有借鉴意义。

Sternberg, Robert J. *College Admiss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2010. 224 pp. ISBN 978-0-674-04823-2. Web site: [www.hup.harvard.edu](http://www.hup.harvard.edu).

本书主要以美国的精英大学为焦点，作

者 Sternberg 认为以标准化测试和高中成绩为主的录取标准不能衡量创造力。他提出了另一种录取标准：在原录取程序上，要求学生再提供有关课外活动和兴趣的开放性问题的额外材料。

Sursock, Andree, and Hanne Smidt. *Trends 2010: A Decade of Change in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Brussels: European Univ. Federation, 2010. 122 pp. ISBN 978-90-78997177. Web site: [www.eua.be](http://www.eua.be).

本书分析了“博洛尼亚进程”十年中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讨论的议题包括学位结构、国际化、学生服务、弹性课程等。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等。书中还提出了对未来行动的建议。

Walsh, Taylor. *Unlocking the Gates: How and Why Leading Universities Are Opening Up Access to Their Cour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2011. 296 pp. ISBN 978-0-14874-8. Web site: [www.press.princeton.edu](http://www.press.princeton.edu).

在线高等教育日益发展。本书对课程学习方式和在线学习进行了案例研究。其中一些案例如 Fathom 和 AllLearn 已经作古。其他案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著名的“开放课件”项目 (Open Course Ware program) 和卡耐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开放学习运动”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 为该话题提供了新视角。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的有关做法以及印度大学的做法在本书中都有所讨论。

